

紫荆礼赞

康乐园里有两百多种植物，紫荆可能是为数最多的，星罗棋布地种植在校园里南北东西各个角落。紫荆花是广大师生喜欢的校花之一，因而康乐园又别名紫荆园，迎接宾客之地，称为“紫荆园宾馆”，学生以紫荆命名自己的社团，称“紫荆诗社”，甚至民间自发遴选“校园八景”，“紫荆迎宾”列为八景之首。可见紫荆花深入莘莘学子和辛勤园丁的心扉。

清明时节，我没有兴致去郊外踏青，而是每天下午四、五时漫步康乐园，考察紫荆花。最近发现留学生二号楼北边、文科大楼北边、图书馆东门外、地环大楼东边、岭南堂北边草坪、善衡楼门前等多处的紫荆花开得十分灿烂，令人陶醉，过往游人也驻足拍摄。

紫荆花花型虽然不大，但其花之多，是其他花所不能比的。那些小而绚丽的花朵，密密层层地爬满了整棵树的每个枝条。像岭南堂北边草坪上唯一的一株紫荆树，看上去找不到几片叶，而花开得灿若红霞，十分壮观，宛如一位艳装少女，在凝眸注视着北校门的牌坊和日夜奔流的珠江水。面对如此良辰美景，我不禁吟出“云淡风轻午后天，傍榕随柳到花前。时人不识老夫乐，或谓偷闲学少年”之句。

紫荆既可庭栽，又可路植，既可供观赏，又可入药，令人喜爱。开出的蓝、紫、白、红斑斓色彩的花朵也令人流连忘返。然而

我想起陆游咏梅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梅花的坚贞。

文/张荣芳

紫荆花体现的精神更应点赞，赋予它时代的价值。

我赞紫荆花平易近人的平民精神。紫荆花有四种类型：宫粉羊蹄甲，花呈粉红色，三至五月开花；白羊蹄甲，花呈白色，三至五月开花；红羊蹄甲，花呈浅粉红色，九至十一月开花；洋紫荆，花呈深紫色，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开花。不管哪种类型，其花、叶特点都非常鲜明，就是叶子顶端两裂形似羊蹄，故称“羊蹄甲”；花冠成蝶形，花都是五瓣，中间一瓣较大，左右各有两瓣，呈左右对称排列。叶和花的这种特色，使人极容易识别，一看便知是紫荆花，这不是一种平民精神吗？

我赞紫荆老树开花的不服老精神。早春时节，紫荆开始孕育骨朵。而骨朵都是长在往年的老枝条上，直接从粗壮的树干上生长出来。紫荆的这个特点，民间就称为“老树开花”。这种精神就像我们校园内，许多离退休的老教工，老有所为，默默奉献，呈现出夕阳无限好，妙在近黄昏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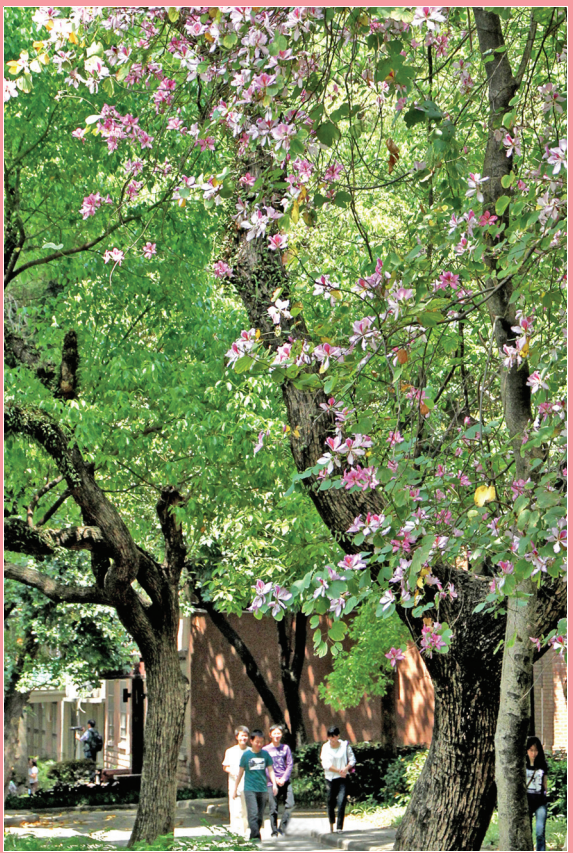
我赞紫荆花坚贞的高尚情操。紫荆花没有沁人的芳香，但是年复一年以似锦繁花缀满枝头，为康乐园增添了无限生机，使学子和园丁感受到自然的美。然而，紫荆花盛开的时间很短，一阵春风吹过，花瓣被吹落时，一下呈现壮丽的紫荆花雨，地上立时铺满各种颜色的花瓣，它的颜色仍不变，依然鲜活。我想起陆游咏梅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梅花的坚贞。我想

以“缤纷落英铺满地，只有色如故”来表彰紫荆花的坚贞情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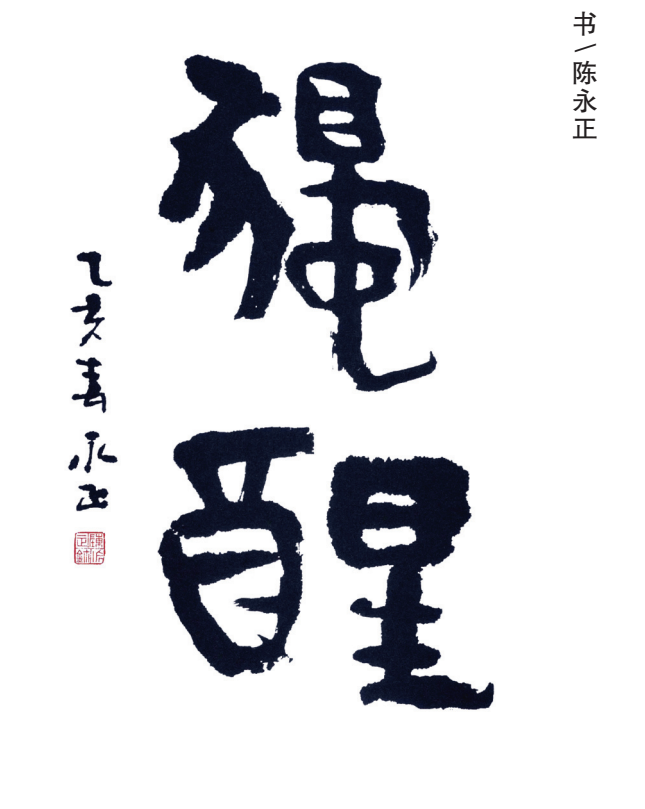
我赞紫荆叶子托红花的奉献精神。紫荆的叶子有一种韧性，不管风吹雨打，叶子从不轻易飘落，在风雨中挺立，有着傲雪斗霜的性格。绿叶虽然没有紫荆花的绚丽芬芳，但却默默无闻地为花输送养料，吸收阳光雨露，衬托那美丽的花朵。我们做人不该有绿叶这种奉献精神么？

我赞紫荆亲情的精神品格。在民间，紫荆往往用来比拟亲情，象征兄弟和睦、家庭兴旺。传说南朝时有一高官，兄弟三人分家。所有财产都分置妥当后，最后发现院子里还有一株枝叶茂盛、花团锦簇的紫荆不好处理。当晚，兄弟三人商量将这株紫荆树截为三段，每人分一段。第二天清早，兄弟三人前去砍树时，发现紫荆树枝叶已全部枯萎，花朵也全部凋落。老大见此状不禁对两个兄弟感叹道：“人不如木也。”后来，兄弟三人又把家合起来，和睦相处。那株紫荆树好像通人性，也随之恢复了生机，长得花繁叶茂。这个故事不就说明了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重要么。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我们应该从兄弟分家故事中，借鉴有益的启示。

康乐园的学子们、园丁们，课余时间，迈开双腿，漫步校园，享受大自然之美，陶冶人文精神，塑造平凡而高尚的人格。



初夏 摄/陈少飞



书／陈永正

工匠的精神

——《潮州手拉壶》序

潮汕人自古酷爱喝茶，世代相传喝出了名满天下的潮州工夫茶，已经成为中华茶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过，爱喝茶的人却未必尽懂茶，更未必知晓与茶相关的种种。即如我，少小离乡，毕生不离茶饮，也是在有幸读了《潮州手拉壶》的书稿后，才恍然发觉家乡除了多姿多彩的茶道，原来还有一个蔚为大观的壶世界。制作手拉壶是一门高深技艺，观赏手拉壶也是大有门道的。

说起壶中极品，大约莫过于宜兴紫砂壶了吧。而说起潮州手拉壶的起源，竟也曾师从于此。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过这样的记载：潮州“老安顺”手拉壶的创始人章大得，于 1843 年从枫溪西塘到江苏宜兴学艺于紫砂壶，回到家乡后结合潮州陶艺不断摸索，最终令手拉壶有别于紫砂壶而自成一派。时至今日，宜兴手拉壶企业甚至要请“老安顺”的后人前去传授技艺。这样一个先拜师而后成师的故事，让我想到了潮

汕文化的一个特质：不排外，不守成，擅吸收，擅超越。

至于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更是反映出潮人文化化具内涵的“精细”二字。《潮州手拉壶》一书中对这些制作工艺有详尽描述，读之眼界大开。潮汕地区自古以来，农业以精耕细作闻名，手工艺以精雕细刻见称，就连潮州菜也成为中华菜系中最讲究精致的代名词。潮州手拉壶的制作过程与内在气韵，同样打上了这样的“潮州制造”的烙印。地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在一把手拉壶中也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传承和渗透。

我的故乡枫溪，是潮州手拉壶的发祥地。手拉壶的老字号“老安顺”、“源兴”、“亮合”等，皆源自枫溪人。身为枫溪人，深感与有荣焉。老字号作为家传技艺，各有各的独门绝活，潮州手拉壶近年名声鹊起，和老字号焕发活力分不开，也和手拉壶注入越来越多新生力量分不开。读《潮州手拉壶》，老字号的传奇固然让人着迷，新生力量的成长也让人欣喜。

最近，我刚好读了晚明著名作家袁宏道 400 多年前所写的一篇叫《时尚》的短文，文中说：“薄技小器，皆得著名。”他特别提到当时的工匠，其中如制作紫砂茶壶的龚春、时大彬等人，认为这些工匠的名声比文人墨士、名公钜卿传得更久远。“当时文人墨士名公钜卿，炫耀一时者，不知湮没多少，而诸匠之名，顾得不朽。”袁宏道此语大有意味。400 多年过去了，当时多少名士大官，早已无人记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龚春、时大彬制作的茶壶，愈发珍贵。读了袁宏道这篇文章，我不禁联想起潮州手拉壶，它的历史虽然不算悠久，也曾师承紫砂茶壶，焉知潮州没有自己的龚春、时大彬呢？

今年广州的冬天，寒意甚薄。一边品茶，一边赏读《潮州手拉壶》，深感温馨惬意。于是，思绪联翩，漫书于此，聊以为序。

灵长类学：作为通往人道的驿站

文化是否是人类独有的？现在看来，答案明显是：并非如此。

文/社会学与人类学院 杨丹禾 张鹏

人类学 (Anthropology) 一词，源于希腊语“人的学问”的复合含义。在人类学的发展初期，其主要关注的是人类在自然界所处的位置、人类的体质特征、人类与包括灵长类在内的动物之间的区别以及人类的进化过程及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切的一切，中心都在于“人”。对人类学学科的定义，国内外的教科书或词典中都有不尽相同的界定。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是研究人的起源与发展，包括人的体质与文化变迁的学问。一般来说，人类学的研究围绕着人最基本的两个属性而展开，即生物性和文化性，因此也就意味着学科设置的大方向基本确定，一为专门研究人类生物属性为对象的体质人类学或生物人类学，二是以人的文化属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而又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分为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人类学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在某些国家，人类学可以是专指研究人类体质的学科，包括灵长类学，即狭义的人类学；在另一些国家，除了体质人类学，还包括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等。

灵长类学的古与今

从最初古埃及的猴神开始，经过神学占上风并将猿视为撒旦象征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进入猴群时代，并历经牛顿时代及法国大革命时代，之后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在西方的出现与发展，在卡尔·林奈将人包括在内的灵长类动物进行分类之后，而从未停下其发展脚步的解剖学，最终在赫胥黎以及达尔文的证实下，灵长类学诞生。进入 20 世纪，在殖民需求的催生下，灵

长类学研究范围拓宽，现代灵长类学的三个支流开始分道：解剖学、行为学（再分为心理学和野外研究两分支）和生物医学研究。之后，灵长类学在欧美和日本分别重建和创立，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使得现代灵长类学开始大放异彩。

灵长类学：作为通向人道的驿站

《感情的猿=人》(日)(菅原和孝,2002)一书作为日本人类学近年来关于人性探讨的有影响力的著作，从中可看到人类学的“感情”研究是如何与灵长类研究结合起来的。在书中作者提到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人类学家，主要是对于他者的行为空间的技术，而人类之外的另外一个他者就是灵长类。(麻国庆,2011)人类学的研究从学科创始之初,“文化”(Culture)一直就为其核心,不论是研究的目標抑或是任务。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不禁发问,文化是否是人类独有的?现在看来,答案明显是:并非如此。在日本长野省地獄谷公园的猴群,面对寒冷的冬季,他们养成了泡温泉的习惯,这一习惯从 1965 年开始,经世代相传被保留下来,而这一行为采取的并非往日在教科书中所说的:动物文化行为往往和取食有关。更进一步,据研究,日本猴之所以能将泡温泉的习惯保留到现在是由于通过母子间学习的方式传播,日本猴形成了母系社会,在此基础上从母亲到女儿世代相传着。(张鹏,渡边邦夫,2009)因此,在这里想说明的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标准在现在已无法被接受。人类学的研究已不再是关于自己本身,自从人被划分进“Primates”(灵长目)中并被保留下来,尽管这可能是曾经博物学家们想要削减人类自大心理或抵抗权威甚至是奇思妙想的结果,人类仅仅是与猿、狐猴在同一个目的中的一个成员而已。今西锦司 (Imanishi Kenji) 曾提出早期人类形成家庭的五大前提条件 (Imanishi, 1972)是在研究了灵长类社会生态的基础上得出的,例如,文化人类学者曾认为近亲繁殖禁忌可能是人类特有的文化之一,而在多个日本学者的研究后发现,在非人灵长类社会中也存在这样的机制,而这是形成家庭的条件之一。再者,在语言 and 智能方面,近年有研究表明,若大型类人猿如果存在类似于人类发声器官,那么它们也许可以跳过肢体语言的过渡就能形成人类的声音语言。(张鹏,2012)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吴汝康就已经说到需要将古人类学和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今人类学相结合。(此处所说的人类学,吴汝康论述的是体质人类学,也叫生物人类学。生物人类学的三个主要领域分别为古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和今人类学。)(吴汝康,1989) 这里他所说的今人类学

(Neanthropology)指生物人类学的一个新分支,是对现代人体的研究。吴汝康认为,今人类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人类和存在亲缘性的猿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人体结构和变化规律以及人体的系统整体性,包括人体结构的层次、变异性和相关性、人体结构与疾病、人体年龄变化和良性差别、衰老、人体对环境的生理反应等等,以及对人种的含义、分类和种族主义批判。(吴汝康,1989)他还提出,今人类学要着重阐述现生的灵长类,古人类学则着重于灵长类的化石研究,其两者虽然侧重不同,但是是互相衔接的,其两者的结合不仅有望为人类学解决现代人种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是人类了解自己的重要手段。

威尔弗雷德·李格罗斯·克拉克在其编写的《人类的祖先》一书中,将“人道”作为其全书的基本原理,而这本书同时作为国外大学生最普遍使用的关于灵长类动物方面的教科书之一。1962 年,约翰·纳皮尔在伦敦建立了灵长类动物学与人类进化研究中心,在中心的墙上写着一句话:“我是一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研究什么都不外行。”虽然这句话看似自视甚高了,但难道这不就正是灵长类学对于人类学意义的所在吗?要说灵长类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的研究。对于西方的灵长类学家来说,他们起初并不知道日本的灵长类学家们已经将自己投身到野外研究中去了。今西锦司,作为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以及国际著名的灵长类权威,于 1960 年在其论文中提出“亚人类”灵长类动物的概念,同时,他还是面对“非人类物种可能是有文化(即社会传播可调节的行为),而不应该把灵长类动物看作是时下流行的机器人”此问题的第一人。更重要的是,他虽然赞同达尔文的思想,但他认为进化是自发的,自然选择则无法解释,于是,提出了“种社会(specia)”的概念,即“整个物种本身被看作是一个社会,内部具有不变的‘物种水平上的同一性’”。(科林·格罗夫斯,2014)

关于灵长类动物的野外工作一开始就从人类学和动物学这两个方面展开并延续至今。同时,灵长类学作为一门人类学与生物学的交叉学科,其注重跨学科的特性十分显著,具有人类学背景的解剖学家 S.阿道夫 (Schulz Adolf)特别强调灵长类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以生物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行为学、分类学等解剖学以外的学科。灵长类学在研究中所使用的行为学方法也很值得人类学借鉴,虽然灵长类学行为学研究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动物与其他生物互动等问题的学科,其对象包括动物的沟通行为、情绪表达、社交行为、学习行为等等。虽然研究对象一个是人类,一个是非人灵长类,但实际上只是换汤不换药,例如在进行人类学田野期间,遇到无法用言语交流的情况时,这是要求人类学者的就是对情境或信息提供人的仔细观察。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始,田野调查一直是人类学所为之骄傲的闪光点。然而,目前看来,人类学者们或正在学习的人类学学生过分地依赖了访谈。灵长类学者需要面对的多是一望无际的森林,长达几个月或更长时间的与猿猴的相处,且不依靠言语,长期观察和记录猿猴的个体和社会行为。虽然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

不同,但其实是相互依赖互补的。

灵长类学的未来？

灵长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国外诸多院校前后都开始了灵长类学的研究教育。在人类学和生物学的结合下,为学科理论建设和方法论的完善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使更多的人加入到研究灵长类的队伍中,探索人类本性和生物特性。在现代灵长类学应运而生的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在国家的支持下就已经建立了 8 个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西方和日本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灵长类学。但对于西方国家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欧洲大陆和北美大陆并没有猿猴的分布,而日本唯一的日本猴在几十年的研究中似乎有些难以找到发光点了。中国作为世界上灵长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有现存灵长类 8 个属 24 种。(张鹏,2012)但相对应的是,高校或是研究中心的数量却不与这丰富的资源成正比。因此,就需要以生物人类学的理论、原理和方法来启发人们对于人类人性和生物特性的探讨,来壮大中国自己的灵长类学。中大人类学系秉承社会文化与生物性相结合,但主要是在体质人类学的范畴内,还需要更多的灵长类学者加入为中国灵长类学,甚至是国际灵长类学出一分力。(麻国庆,2011)

灵长类学家克利夫·祖莉和考古学家皮特·阿柯在一篇古典论文中清楚地证明了,“sphinx”一定是狮尾狒 (Theropithecus gelada)。假如说斯芬克斯始终作为一只狮尾狒,也许会增添一份苦涩。因为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这些“威胁”人类自我时,人类才会不遗余力来证明人性。这是这个时代的一则寓言故事,人类只有与其最亲近的亲缘共处一室时,才能使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本性。

